

论主流经济理论演进的若干新特征

汪浩瀚

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之前,经济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古典和新古典两个时期。在长达一百多年的进程中,经济自由主义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由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创立的古典学派将经验归纳和抽象演绎结合起来,初步建立了描述市场机制精巧运行的经济体系;马歇尔遵循渐进连续的逻辑,借助牛顿经典力学方法将“看不见的手”推演成为新古典体系,后经瓦尔拉斯、帕累托和德布罗等人的精雕细琢,完成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大厦的建构。20 世纪 30 年代初,西方经济世界空前的经济大危机使传统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失灵,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以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三大心理规律为基础,并依托有效需求原理及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为其理论支撑,后经萨缪尔森、汉森、托宾和索洛等人的补充发展日益完善,形成了一套以需求管理为核心、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的宏观理论体系,长期占据经济学的主流地位。进入 50 年代之后,自然科学令人眼花缭乱的革新,为经济学科真正步入科学殿堂不断提供新范式,使经济学的发展呈现出微观宏观一体化、非主流化、基本假定的宽泛等新特征,孕育着在不远的将来,经济学会建立在一个超越经典动力学范式且更科学规范的方法论体系之上。

一、方法论、分析范式的转换与更替

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在初创阶段源于英国的经验主义或法国的理性主义两种哲学方法论,配第注重归纳法,而魁奈则注重理性分析和演绎,斯密将这两种方法加以结合形成了自己的二重方法论,并以此创建了第一个系统的经济学体系。在其《国富论》发表后的一百多年中,经济理论选择的传统准则一直遵循理性选择与最大化原则。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物理学的发展为经济学尝试建立公理化体系注入了可借鉴的创造性思维方式,经济学开始步诸多自然科学的后尘,姗姗来迟走上了构建公理化体系的艰难道路。李嘉图创建了一个方法论变革的方向,其思想和方法的渊源直接源于斯密,他是斯密之后第一个运用抽象方法的经济学家。李嘉图方法力求使用斯密的抽象法研究经济问题,他演绎地把宏观经济的相互关系简化成为特定范围内变量之间的正式表述,在准确发现了斯密二重方法论的矛盾后,对斯密的现象描述法进行了批判,并以从抽象到具体的演绎,建立起一元论述体系。约翰·穆勒是第一个就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深入思考的人,他明确地提倡对人类科学应采用一种有效的因果模

式来解释,借助于哲学发展中实证主义的出现,为经济学方法论的系统化找到了坚实的基础。在穆勒和马歇尔之间的年代里,经济理论经历了被称之为边际革命的重要转变,边际主义除了将最优化原理带入经济学理论舞台的中心,还首次在经济理论的形式化方面大规模地使用数学,为经济学带来了精确性和清晰性。边际主义的方法论主要是公理化的演绎方法,它依据一个有限集的公理对应个体行为,理论结构能够用演绎逻辑方式导出,从而将经济学研究变成建立一个完全的逻辑系统。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可以说是在马歇尔手中形成,他认为人类科学和特定意义上的经济学应该尽可能密切地遵循自然科学的方法,他是第一个沿着边际主义轨迹对经济理论作出详细综合的系统阐述者,并竭力主张各种理论应依据“边际上的替代原理”,亦即今天我们称之为的最大化原理来建立。他用数学组织起一个严密的经济学体系,从而使经济学知识加速积累的效果比其他社会科学更显著。在经济学中长期占支配地位的新古典范式,致力于在最大化假设下研究机制均衡问题,其理论分析并不关心所设定的假设是否符合现实世界,而是沉浸于牛顿经典力学简单、机械、确定的隐喻和假定条件之中,最优化原理对主流经济学中的一切解释性理论来说居于中心地位。经济学理论的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讲首先是经济方法论的危机,经济理论的突破和发展也首先是经济方法论的进步与创新。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功与困境均在于它把从李嘉图开始的方法论变革加以完成并推向极端。主流经济学家为了说明对有关方法论问题的讨论,主张应当在自然和人类科学之间设定方法上严格一致的统一。自波普可证伪性方法论标准被引入经济学之后,经济学方法论的分析思维开始转向内在实证性、可证伪性、演绎检验及理论的评价标准等问题上。货币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将经济学等同于类似于物理学的自然科学,他所倡导的“工具主义”方法论认为假设的现实性无关紧要,注重经验检验理论真伪的重要性,基本理论可以通过事实加以证实。后凯恩斯主义范式不再研究稀缺资源是如何配置以满足人们的无限需要,而是研究实际经济系统如何随时间变动,经济过程被看作是无规律的,具有循环和累积因果特征。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领军人物卢卡斯的研究范式旨在从实践意义上对凯恩斯革命的否定,其主要目的是在一种更高级和满意的形式上解释宏观经济现象,进而能够在可供选择的经济政策之间给出可靠的选择标准。制度学派强烈反对公理化运用演

绎分析的正统分析模式,其代表人物凡勃伦不赞成建立在理性人假定上的机械行为分析,主张引入人类学和心理学的概念对经济行为进行分析。20世纪60年代初斯蒂格勒《信息经济学》的发表,标志着信息经济学的破茧而出,促进了信息范式的形成。信息范式是对新古典范式的扬弃,在更多保留了新古典的均衡分析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边际分析方法等基础上,通过修正其最大化效用动机假设和完备信息基本假设而替代新古典范式,大大拓宽了经济分析的解释能力。混沌理论和一般意义上的复杂性理论是当今科学领域最引人瞩目的理论之一,70年代、80年代混沌经济学开始进入主流经济学领地,对主流经济的均衡、理性行为等观念提出全面挑战,为经济学科摆脱传统经济学的思维定式,在新的范式下形成更一般的科学方法论找到了钥匙,从而促使以探索经济系统非线性机制及其规律为目标的非线性经济学将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前沿。非线性研究对解释丰富多彩、复杂多变的经济世界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非线性相互作用意味着游戏本身包括了改变游戏的方法,即一个过程的结果会影响到过程本身,其方法论价值是不可估量的。随着非线性基本范式的形成,非线性经济学描述系统复杂性、不规则性、不稳定性、不可测性的手段将会日渐成熟,为人们重新思考社会经济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为宏观经济学寻找微观基础的潮流

关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涉及依据总量表示的理论与构成决策制定单位基础的行为之间的关系,它包括行为的协调、决策者对其行动的不确定后果的反应及均衡的含义等。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问世之前,宏观经济学领域并不存在,所有经济理论均是建构在个体水平之上。自凯恩斯革命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产生了分立,微观经济分析以一般均衡论为基础,宏观经济学则以非均衡论为基础,宏观经济学试图建立总量指标的变化模型,微观经济学倾向于从强调需求和供给之间内在相互作用的模型中导出一种简洁形式,一般均衡论者通过对竞争性均衡等抽象性命题的设定,研究整个系统的需求和供给,试图在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架起一座联结的桥梁。由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缺乏一个基于一般均衡的坚实基础,其总量曲线不能说明以最优化为目标的微观个体行为,无法预测经济如何对经济政策作出反应,难以制定恰如其份的宏观经济政策,因而也就不能对不同的经济政策选择提供可靠标准。在凯恩斯主义宏观模型中,经济当事人不以追求最大化为目标,同一主体在不同模型中具有不同行为等均违背了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凯恩斯宏观理论与一般均衡理论存在着明显的不相容性,源于凯恩斯的微观与宏观分析间的明显不一致性是新古典经济学存在的基本问题。微观与宏观的脱节吸引着一些经济学家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中的总量经济关系寻找微观基础,如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和弗里德曼持久收入假说关于宏观消费函数的研究,乔根森和托宾分别对投资需求与货币需求的分析,都试图从微观个体行为中引申出宏观意义上的总体特征及系统内部经济因素的关联性。但这些理论将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精巧拼接的实质并没有给宏观分析奠定微观基础,促使经济学家另辟蹊径,导致

70年代开始宏观经济学微观化的理论探索硕果累累,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经济学等分支流派。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渊源于古典与新古典的自由市场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说的合理延伸,它将预期纳入宏观经济分析,认为经济行为人会利用一切机会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市场出清与理性预期是其理论政策的出发点。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卢卡斯、萨金特和巴罗等认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存在两大缺陷,一是缺乏微观基础,二是缺少宏观价格理论,因此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就是自由市场理论,宏观价格理论就是理性预期条件下的价格决定理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硬核在于其坚定地倡导所有宏观经济理论必须基于个体最优化行为来建立,其成功之处不仅仅在于提出了新的预期机制,而是它明确地把微观理论作为宏观分析的基础,并将二者有机地加以结合。宏观经济活动是许多个体经济活动的总和,因此宏观经济中一切涉及人的行为假定应当有微观基础。在新古典宏观经济的视野里,凯恩斯革命切断了支撑自身宏观理论的一些重要表述与一般均衡理论的联接,特别是其与最大化微观假设的矛盾。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崛起动摇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根基,促成整个宏观经济理论朝着逻辑一致的方向推进。根据微观假设和行为来解释和说明宏观经济现象及总量关系,已成为近二三十年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主线。

70年代末,当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浪潮席卷宏观经济领域时,以曼昆、萨默斯、斯蒂格利茨、布兰查德等为代表的一批新凯恩斯主义者,坚持凯恩斯主义信条,力图从理论上改进凯恩斯主义。他们吸收了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的理性预期假设,重新引入凯恩斯主义忽视的经济当事人最大化原则,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为其寻找经验证据,借助有微观经济基础的模型阐释了工资和价格粘性等问题,以取代凯恩斯主义的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以工资、价格粘性和非市场出清假设替代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工资、价格弹性和市场出清假设。新凯恩斯主义试图从产品、劳动和资本市场的微观运行机制基础上重建宏观经济学,以新的理论形式复兴凯恩斯主义。该理论系统阐明了工资和价格的粘性使市场不能出清,即使公众有理性预期存在,政府的经济政策也能影响就业和产量,政府干预具有稳定经济的作用,从而为传统意义上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增添了众多新鲜内容,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微观基础。

三、为微观经济学构建宏观基础的探索

事实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所提供的微观基础到目前为止还不能令人满意,它对微观基础研究是限定在非常特殊的假定下,所依据的关键假设:模型的决策制定者们是代表性的代理人,其行为非常好的近似于经济的总量行为。然而这种假定隐密地消除了宏观经济研究的主要问题:个体行为人与人之间的总量问题和协调的失败,同时否认了被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所坚持的诸如不确定性、非均衡、结构变动的不稳定性等问题的重要性。要实现微观与宏观理论真正意义的综合,不仅要考虑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更要考虑微观经济学的宏观基础。在传统个体选择理论看来,总量结果是从没

有环境背景决定的代表性经济主体的决策中获得,与宏观的微观基础不存在任何联系。依据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兰德的观点,要想进行有意义的微观分析,必须首先决定制定微观决策所基于的宏观环境背景,如果不同时考虑研究微观经济学的宏观基础,仅从微观经济学原理试图尝试建立一个统一一致的宏观经济理论是注定会失败的。关于可能由多种因素引起的协调失灵的根本原因意味着多重均衡存在的可能性,由于政策体系的变动会改变个体代理人最优化的结构参数,因而个体行为间的联系得以建立。通过这些联系,协调失灵和与制度变化相关的政策构成我们要建立的微观经济学的宏观基础,即相关的市场理论。基于现有微观理论基础上的模型是对市场作了假设,没有涉及有关个人如何选择和市场如何构建,因此微观分析迫切需要宏观基础。瓦尔拉斯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并没有提供一个适宜的宏观基础,因为瓦尔拉斯市场不具备局部稳定性的最低逻辑要求,而任何用于一个宏观基础的制度结构至少应当满足局部稳定性。同时,传统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结构对个体非制度背景环境下完全理性决策的要求过于苛刻,微观经济学的宏观基础只能适合于有限理性意义下的一种制度和预期的环境背景。为此,后瓦尔拉斯经济学尝试用不同于新古典理论的代表性代理人方式建立微观经济学的宏观基础,该理论要求代表性代理人应把宏观制度约束到相应行为中。迄今为止,所有为宏观经济提供微观基础的努力都是基于线性动态意义上的单一均衡总量生产函数,从微观角度出发构造具有宏观基础的模型所采用的标准总量生产函数与多重总量均衡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因此也就和设想达到具有相同资本、劳动投入却有不同产出水平的目标的视点不兼容。要想把宏观意义上的内涵结合进模型,就必须明确规定一种和个体企业生产函数有不同性质的总量生产函数。这方面的探索仍在进行。

20 世纪 80 年代以罗森、杨小凯、博兰等一些经济学家运用超边际分析重新将古典经济学分工与专业化这一核心思想复活,形成了分工演进学派,又称作新兴古典经济学。按其理论,所有宏观经济现象都可以在这个理论框架内分析,没有宏观与微观经济学的分立,当代发展势头强劲的各宏观经济理论分支如交易费用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等均可以被整合成一个新的主流学派,从而将互相孤立的各宏观分支理论用一个内在一致的形式统一起来,使整个经济学的结果发生重大变革。

四、非主流不断融入主流的趋势

自 19 世纪 70 年代后,经济学开始分化为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前者包括边际学派、新古典学派等,后者包括新历史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及公共选择学派等。主流经济学把经济行为设定为面对稀缺资源进行选择,整个主流经济理论可以被看作是为选择纯粹意义上的正式效用理论,从而获得一种满意程度的实现过程。由于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侧重于对经济现象的逻辑演绎分析,忽视了现实社会制度和行为的分析,其局限性日趋显现,从某种意义上看,经济学的根本任务就是分析人的选择。近几十年来,经济理论在诸如婚姻、家庭、生育、民主政治、犯罪与歧视、法律等非主流经济领域有了快

速发展,它们均遵循效用最大化原理的选择模式。20 世纪 50 年代贝克尔开创的人类行为经济学研究,用理性人假设解释了婚姻、家庭、生育等问题,拓宽了偏好的范围,吸纳了一些非经济因素进入其分析模式,长期被排斥在主流经济的大门之外。几乎在同一时期,以布坎南、塔洛克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首次将经济学与政治学相融合,把经济学带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该理论运用微观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将理性人假设引入到政治行为的分析中,主张经济自由主义,与当时占主流地位的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格格不入。近年来法律对经济转轨、经济发展的影响已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内容,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前沿。新制度经济学最直接的理论渊源是科斯 1937 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它以新古典经济学作为其理论基础,力图拓展新古典理论仅关注资源配置的狭窄领域,侧重从微观角度研究制度构成、运行及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其理论主要包括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新产业组织理论、现代企业理论等,新制度经济学建立在把新古典经济学更一般化的方法论基础之上,抛弃了新古典理论过于极端假定的二分法——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改变了新古典的分析范式。诺思进一步通过引入制度和时间范畴把制度约束与个人理性选择联系起来,重新解释了经济制度的演变过程,最终建立了以新古典方法为基础的制度变迁理论,使得制度理论在新古典个人主义范式上实现了统一。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遭主流排斥的非主流经济学开始融入主流,主流与非主流的界限日渐模糊,主流经济学正经历着大的拓展和重新整合。

五、基本假定宽泛、逼近现实的变革

任何学科的发展,并不在于依据已有的假设推演出新的结果,而在于创造性地改造已有的假设,使某种定型的理论体系发生大的更新,且能容纳更多新知识、新内容。一种理论的范围是被假设所限定的,特别是附加的假定会限制或缩小该理论的范围。因此如果若干假设能够被更弱一些假设代替,那么这个理论一定更具一般性。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是其演绎推理的逻辑前提,理性人假定是其基石性假定,它具体体现着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厂商追求利润最大、政府追求宏观经济总体目标最优等。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把一种会计、有创造性并能获得最大利益的理性人假定作为一切经济分析的出发点,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偏好稳定等基本假定成为微观经济分析的核心。近 20 年来,经济理论发展的根本特征是在坚守理性人假设的基础上,通过对其他若干基本假定及辅助假定的调整,逐渐将原有的外生因素容纳进来,促使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更接近实际,偏好、技术、组织、交易费用、制度等能够被赋予基于理性假定的内涵。舒尔茨以劳动力的异质化假定为突破口,成功地以其“人力资本”理论说明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难以解释的经济增长之谜,罗默进一步修正了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把人力资本和新知识作为新增要素内生,强调专业化的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最终使总的规模收益递增,突破了经济增长理论中要素收益递减和收益不变假定,诠释了内生长期增长的奥秘在于实现生产率提高的增长与人力资本积累间相互推

动机制的良性循环。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前提假定是经济理性和个人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虽然在理论观点上存在无法兼容的对立,但都信奉理性人假定。新制度经济学承继利用了主流经济学的最核心假定:“理性精神”;在保留了新古典主义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和均衡分析方法三大法则的框架内加入正的交易费用,其实质是实现制度方法与新古典理论的整合。诺思直接建立在新古典主义工具理性传统之上的制度变迁理论的最为显著的特征是“这一分析框架是对新古典理论的修正,它保留了竞争和微观经济理论的分析工具;它所修正的是理性假设;它所增加的是时间维度。”西蒙对包括企业利润最大化在内的最大化行为假定进行了抨击,他认为“完全理性”假定忽视了人们在决策时真实世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个人行为既包含理性因素,又包含非理性因素。西蒙率先提出“有限理性”假定以取代完全理性,并用一种符合实际的理性行为,来取代经济人那种全能全智的理性行为,即包括生物(包括人在内)在其生存环境中所具备的信息存取能力和计算能力的一种理性行为。”新兴古典经济学通过突破新古典经济学规模收益不变和消费者与生产者分离的假定,将专业化分工机制引入主流经济学,着手建立制度演进和市场均衡相统一的理论框架,仍是

坚持了理性人假设。随着博弈论开始进入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定被打破,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则被进一步强化,运用博弈方法描述经济世界更逼近现实,以博弈论为基础整个宏微观经济理论体系正经历着大的重构。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经济学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主流经济理论不断演进,造就着经济理论大厦的辉煌与繁荣,与此同时,实际生活中经常出现的新矛盾又频繁冲击着传统经济体系,推动着经济学科超越传统实现分析框架的“革命”。如何建立一个能包容并解释千变万化复杂经济行为的更为宽阔的理论体系,无疑极具挑战性,也代表着本世纪经济学变化的新趋势。

注释:

诺思:《时间进程中的经济绩效》,载《经济与社会体制比较》,1995(6)。
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中文版,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作者单位: 宁波大学商学院 宁波 315211)
(责任编辑: 曾国安)

(上接第 76 页)

我国产业政策的形成与传递过程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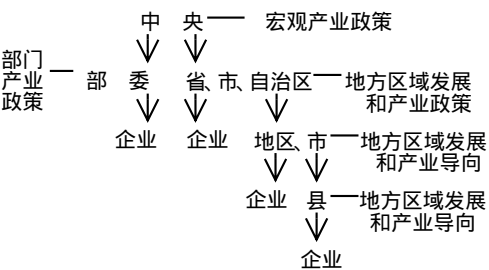


图 2

针对我国产业政策传导存在的问题,必须着眼于提高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加快转变政府管理职能,采用具体明确的调控手段,营造良好的微观经济基础。有效传递、执行产业政策只是获取良好政策效果的必要条件,而产业政策制定是否合理、是否可行、是否具有持续性,是正确实施产业导向的基础和先决条件。

在“转轨”时期,我国制定、推行产业政策必须正确、全面地处理和解决好几方面关系,以确保产业政策的有效性。

一是要处理好集中决策与分散决策的关系。中央制定宏观产业政策,各地方、各部门也根据各自区域和行业发展需要确定产业政策。如果宏观产业政策不能与区域产业政策、行业发展规划有效衔接,势必造成政出多门、政策不统一的局面,以致宏观产业政策没有权威性可言,地方与部门各行其是。所以必须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部门与地方之间制定产业政策方面的关系。地方、部门的政策必须以中央政策为基础,结合各地区、各行业的特点,以比较优势来确定自身的

发展,着力推动资源在各地区、各行业的合理流动与配置,实现优势互补型和有效竞争型的产业发展格局。

二是要处理好存量结构与增量结构的关系。存量结构性矛盾的膨胀和增量结构性矛盾的再造,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在存量方面,劣势企业和劣质产品难以淘汰,大量不良资产沉积使国有经济重组、改造、改革困难重重,与之相联的下岗再就业的压力十分沉重;在增量方面,投资管理体制条块分割的局面没有大的改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企业投融资功能尚未真正确立,盲目上马的项目纷纷落马。如何针对存量和增量结构的症结,实行有差别的方法措施,推进存量的优化重组,建立增量管理的新机制,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所在。

三是要处理好规模效应与数量效应的关系。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大,我国企业日益暴露出缺乏规模效益、资源过度分散化而造成竞争力不强、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产业内企业数目过多和生产的分散化,造成过度竞争、设备闲置、产品库存积压、企业效益低下乃至亏损等不良后果,产业组织结构问题已累积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加快调整势在必行。但我国人口众多,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城镇就业与再就业问题也显得较为突出。所以,我国要实现工业化、推进现代化,一方面要通过有规模效应企业的快速发展带动经济增长,提高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也要重视中小企业的成长,扩大就业途径,增加消费面,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作者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上海 200002)
(责任编辑: 金萍)